

史家

是怎样炼成的

谢宝耿学者访谈录

SHIJIA SHIZENYANGLIANCHENGDE

谢宝耿◎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史家

是怎样炼成的

SHIJIA SHIZENYANGLIANCHENGDE

谢宝耿学者访谈录

谢宝耿◎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家是怎样炼成的:谢宝耿学者访谈录/谢宝耿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326-2847-6

I. 史... II. 谢... III. 史学家—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222 号

责任编辑 王圣良
助理编辑 胡欣轩
装帧设计 汪 溪

史家是怎样炼成的

——谢宝耿学者访谈录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1 字数 278 000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847-6/K·623

定价:1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6511611

前言

历史学家是怎样炼成的？请看《史家是怎样炼成的》，该书给读者提供了史学的入门方法、攀登路标、深入武器和智慧启迪。

我在《学术月刊》杂志社工作了近三十年，令我欣慰的是，在编辑业务往来中，与一批优秀学者——目前崭露头角的史学界中坚，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合作也很愉快，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对他们的“中青年专家访谈”，已成为学界美谈。《学术月刊》自1999年开辟“中青年专家网页”专栏，至2005年本人退休这六年，其中有关历史学专家的访谈都由我主持，至今已见刊学者近20人（文章分别刊登在《学术月刊》1999—2005年的第4、8、12期上），诸如熊月之、钱杭、李向平、苏智良、戴鞍钢、谢维扬、陈燮君、宋镇豪、葛剑雄、周积明、李伟国、张云、许纪霖、黄朴民、虞和平、严耀中、江晓原、邵勤等。这些专家都是学有所成、学有所长的当今史学领域的精英，也是史学界承前启后的中坚，其涉足范围颇广，有治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或思想史、军事史、文化史、现代化史，乃至宗教史、科技史等，对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步入学术殿堂的经历、治学经验和学术成果等，呈现了“炼”的轨迹，为史学研究的后来者树立了有血有肉的学习榜样。

金末文学家元好问的《论诗》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以往不少技艺高超的能人只给人们看成果——“绣”出的极佳“鸳鸯”，而不将其制作诀窍——“金针”传授他人。难能可贵

的是，本书的访谈者反其道而行之，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炼”的经验、体会、窍门、秘诀和挫折等全盘托出，对人们有借鉴、启迪、开智的作用，以使后学在攀登史学高峰时少走弯路，可在其肩膀上“炼”得更快更好；同时，访谈者的事迹也为史学界积累学术发展素材提供了基础，故这些文章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大多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报刊转载，在学术界反映良好。

可惜这些文章散发在各期杂志上，查阅不太方便，其作用发挥也受到限制。承上海辞书出版社慧眼明鉴，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浪潮中不计成本、大力支持，尤其是文博编辑室王圣良主任的竭诚促进，终于将此结集成书出版，以飨有志于攀登史学高峰的莘莘学子和广大读者，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访谈的史家，仅是史学界中的代表，并非全部，还有很多史学精英由于时间不及和本人面临退休而无法完成尽悉“入彀”的系统计划，这个遗憾只能有待我的接班者去弥补了。还应说明的是，本书访谈的每位史家，他们对访谈内容所花心血、所作贡献远超笔者，他们无疑是更重要的著者，但限于体例，无法在版权页一一署名，在此谨致歉意和谢忱。同时，由于逝水流年，不少史家的工作岗位和职务也有变动，如熊月之先生，访谈时职务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而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葛剑雄先生，原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而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防止文中内容出现抵牾，我们还是以访谈时的职务为准，敬请谅解。样板的作用是巨大的，愿本书能在促进史学人材的成长中起一点绵薄之力。

本书的编排顺序依照《学术月刊》发表先后而定；为了便于管窥老专家的学术风采，另附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旅游学专家丁季华教授的访谈文章，相信读者细阅后必有裨益。

谢宝耿

2009年春于上海康衢大楼

目录

前言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熊月之研究员访谈 /1

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

——钱杭研究员访谈 /14

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阐释

——李向平教授访谈 /27

敢于和善于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苏智良教授访谈 /38

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戴鞍钢教授访谈 /47

探知中国国家起源的心路

——谢维扬教授访谈 /56

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陈燮君研究员访谈 /66

古史研究：会通多学科与启动现代思维

——宋镇豪研究员访谈 / 82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继承传统面向世界

——葛剑雄教授访谈 / 92

文化史研究：以点带面转换视域

——周积明教授访谈 / 104

钟情敦煌学和宋史：学者型的出版人

——李伟国编审访谈 / 117

融会党史与军事史研究：从戎三军的学者

——张云教授访谈 / 130

置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教授访谈 / 143

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黄朴民教授访谈 / 156

努力创建中国现代化史学科

——虞和平研究员访谈 / 174

古史研究：从多方结合到独辟蹊径

——严耀中教授访谈 / 190

从科学史到科学文化

——江晓原教授访谈 / 201

以小见大：城市史研究新视角

——邵勤教授访谈 / 218

开拓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朱子彦教授访谈 / 235

附录

社会学家话经济改革

——访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 /249

点穴长三角旅游经济

——访著名旅游学专家丁季华教授 /257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熊月之研究员访谈

熊月之，江苏淮阴人，1949年生，30岁以前读书、务农、当兵，1978年考入苏州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师从陈旭麓教授。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分配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林》杂志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史志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曾多次到美、英、德、法、日等国作学术访问和交流。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通史》（15卷本，主编并撰著《总论》、《晚清政治》、《晚清文化》卷）、《章太炎》、《向专制主义告别》等书，其中多部著作获中国国家图书奖、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并被译成外文在日本、丹麦等国出版。参与编写《上海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书。担任《辞海》近代史分卷主编（1999年版）、《老上海人名事名物大观》主编。撰有论文百余篇，其中《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全国首届青年史学工作者辛亥革命讨论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获全国首届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一等奖，《略论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等。

谢:熊先生,您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们就相识相交,至今已有20多年,对您的情况我略有所知,也许可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您,即您在读书学习期间广纳各师之长,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上海史研究中,又广融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故您的学问和成就就能成其大。今天访谈就是想较详细地了解您的学术道路和心路历程。

熊:说实在话,我走上学术道路比较特别。我出生在苏北偏僻的乡村,父祖辈都是道地的农民,没有人读过书。我在中学里爱好的也不是文科,而是数理化,特别是数学,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其实不是出于爱好,而是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在1972年高中毕业,年底应征到上海警备区当兵。高中毕业在部队里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因此,帮助文盲和文化比较低的战士学文化、写信,帮助连队、团部出黑板报、写通讯报道、总结报告,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1974年,社会上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理论队伍注释所谓法家著作,评法批儒。上海共成立六个注释组,包括韩非子组、王安石组、章太炎组等,每个组均由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四部分人组成。我受部队的指派,参加这项工作,被分配到章太炎组。

章太炎组共20人,工人、农民(多数为农场职工)、解放军、知识分子各5名。解放军成员中,有3名干部,2名战士,我是战士之一,另外一名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是充满荒唐的岁月,所谓工农兵代表,连古书也没有读过几本,要去注释素以古奥出名的章太炎著作岂不是天方夜谭!因此,所谓三结合注释,实际是工农兵跟着知识分子学习注释。章太炎组的5名知识分子是蔡尚思(没有参加实际工作)、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这些人都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学者。老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断句、标点、释义,如何查找工具书、核对引文,如何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老师们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态度,让我们受益终身。注释组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调集了大批与注释有关的图书。章太炎著作古今中外、儒佛道耶,无所不涉,我们阅读的范围也就随着章太炎的写作兴趣而转移。章太炎组挂靠单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年轻的同志大多住在学校里,历史系的课程我们可以随便去听,学校里许多活动(如社会调查等)也让我们一道参加。这样,首尾三年,我们扎扎实实地读了一些书,对历史学由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由于有了在复旦大学的这段经历,有了这段与历史学的因缘,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考取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1978

年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成为陈旭麓先生的学生。

谢：陈旭麓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教过我近代史课程的老师。他不但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广泛，而且对人很真诚，特别对青年人有一种天职般的关爱。记得我们毕业十周年时，在复旦大学搞了个小型纪念活动，邀请陈先生来参加，他欣然应允，而且来时服饰穿得很庄重，以示祝贺。我有幸还与他单独合影留念。当然，因我是学古代史专业的，没能更多更深地向他讨教，但他的近代史的深厚学识，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目前从事编辑和审读这方面的稿子作用很大。可见，您作为陈门嫡传弟子必然教益更大。

熊：诚如您所说，在从事史学研究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导师陈旭麓先生。先生治学视野宏阔，气势磅礴，无古今之畛域，无文史之鸿沟，既重视具体的资料，更重视贯通的学理，小处落墨，大处着眼，为文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令人赞叹。先生不光是著名的学者，而且是难遇的良师，博学大度，循循善诱。“文革”以后的研究生中，我与先生交往时间比较长、接触比较多，在治学、做人方面，也努力向先生学习。但是，有些属于天赋方面的东西，不是后天努力所能学会的。对于先生的思辨能力、笔下功夫，我自忖资质鲁钝，永远无法望先生之项背。

谢：请具体谈谈陈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专业学习，以及您是怎样选择专业目标的？

熊：陈先生对研究生的治学范围，并无严格规定，主要由学生自己选择。我因参加过章太炎著作的注释，以前接触的资料大多与思想史有关，在复旦大学接触到的学者也多治思想史，耳濡目染，因此我在随陈先生读书期间，就选择了思想史。

思想史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天地，从哪里入手呢？我的选择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之所以作此选择，主要处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对“文革”的反思。“文革”惨剧的发生，根本原因之一是缺少民主制度，这是尽人皆知的。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制度？这就值得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二与我本人的阅历有关。我长期生活在贫穷、落后农村的最底层。我的家乡到1986年才通上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劳动力不及一只老母鸡，即一天所挣工分不值一个鸡蛋。我父亲连生产队小组长也没有做过，无权无势。我家和许许多多与我家类似的家庭，饱受一些名为地方干部实为地痞无赖、贪官污吏的欺压。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追根溯源，也与没有民主制度、缺乏监督有关。其三与学术史现状

有关。我梳理了关于近代民主思想史的研究资料，发现以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

谢：人们常说，文艺创作来源于实践的体验，凡传世名著，大多是饱经沧桑后的凝练。看来搞理论研究也与此同理。除此之外，您的治学是否还有其他师长的影响？

熊：当然有。说到对我治学的影响，不能不说到姜义华先生。在章太炎著作注释组的时候，姜先生还单身在上海，和我们年轻人接触最多，白天一起注释，晚上一起吃夜餐，一起下乡，一起下棋，一起吃螃蟹。他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也是我历史学的启蒙老师，对我帮助极大。我那时写的题解、文章，每篇都是他指导、修改的。有时一篇几百字的文章，他会叫我改五六遍甚至七八遍，改得我昏天黑地。正是他的严格要求，我在写作方面才稍稍有些进步。姜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他那身处逆境、永不气馁、胸怀天下、奋斗不止、永远乐观向上的气质。此外，汤志钧先生对传统典籍的熟谙，朱维铮先生的博闻强识，对马列著作如数家珍，对人情世态洞察入微，都令我眼界大开，受益良多。

谢：有了这些广纳各师之长的基础，再加上研究生三年苦读，您的学术根底无疑会更扎实，想必会促使您向学术创作方面跃跃欲试。

熊：是的。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三年，除了必修课，其他时间我主要用于研究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到1981年将研究心得写成基本书稿，并发表了一批论文，从黄宗羲、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到章太炎。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主思想的论文，在1981年全国首届青年史学工作者辛亥革命讨论会议上（长沙）获得一等奖，这更鼓舞了我的信心。我原以此书稿作为毕业论文，后担心涉及面太宽，答辩困难，导师建议我另换小一点的题目。于是，我另写了《论郭嵩焘》作为硕士论文。毕业以后，又花了两三年时间，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改完成，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谢：据我所知，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不但获得了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而且还被指定为复旦大学等校外国留学生的教科书，并被译成日文版作为日本一些汉学专业的指定必读书。那么，请问此书有哪些学术特色？

熊：首先，此书比较扎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酝酿、产生、发展的历史；其次，它讨论了近代民主思想与古代民本、重民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其三，它讨论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变

※

※

异，指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在一开始就具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特点，与西方民主思想发展轨迹大不相同；其四，它既研究了著名思想家的关于民主的思想，也讨论了普通民众对民主的看法。

谢：您的另一部获奖作品《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解决了学术界存在的很多疑案和似是而非的问题，我想写此书您一定花了不少功夫。

熊：是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重点是研究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积十来年的功夫写成的。这是一部实证性的、也是通论性的著作。为写这部著作，我除了尽力查考了国内的西书，还利用出国作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了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傅兰雅档案，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处收藏的汉学西书。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呢？主要是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在讨论中西文化时，一些学者在讲西方文化的影响如何如何，有说影响大，有说影响小，但他们所利用的资料大体上相同，如果深问一句，在某些领域，影响究竟如何，影响过程究竟如何，谁在传播，谁在接受，为什么接受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我们就会发现，此前在这个领域里细化研究太少。问题是那么重要，研究基础又是那么薄弱。于是，我就不揣鄙陋，做了这个题目，作了一些个案研究，也作了一些量化分析。做了这个研究以后我发现，德国、日本、香港都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有待深入的问题太多了。现在，我和他们都有这方面的合作课题。

谢：您的出生地并不是上海，到现在上海话还是听得懂、说不好。您个人早期写的三本书，即《章太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都不是专门讨论上海历史的。那么，您是怎么与上海史发生关系，对上海史产生兴趣的呢？

熊：其实，那三本书，每本都与上海有密切关系，其间还有交叉、重合部分。

我写《章太炎》时，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陈旭麓先生一直强调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章太炎就是在上海出名的，他一生最为轰轰烈烈的事情，便是在“苏报案”中特立独行。“苏报案”的发生，正是晚清上海奇特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的综合反映。从那时起，我便对近代上海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进入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分在上海史室，跟随唐振常先生编撰《上海史》，边学边写。我写了其中的9章，另加前言，凡28万字，内容主要为晚清政治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内容是“章太炎与晚清政治”课题的放大与

延伸。《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与上海的关系更深，近代上海不仅是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基地，而且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心，是从王韬、郑观应到梁启超、章太炎、邹容等鼓吹民权、民主的志士仁人的重要舞台。换一种目光，这些资料就变成了上海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资料。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其中八成以上的资料都与上海有关。除此之外，我还先后参加了张仲礼先生主持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全国、上海市重大课题。

谢：您主编的15卷本、600万字的《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并获得上海社科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和中国国家图书奖，可喜可贺。能否谈谈此书写作的背景？

熊：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1956年建所以来，一直将上海史列为研究重点，领导屡易而重点不易，岁月流动而重点不动，旁搜远绍，探赜索隐，冷凳寒窗，风雨无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编写、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四运动在上海》等多种大型专题资料汇编。1978年以后，历史所的学者又编写出版了一长串上海史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上海史》、《上海工人运动史》、《五卅运动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石库门：寻常人家》等专著，《上海史研究》、《工运史鸣辨录》、《近代上海探索录》等论文集，《上海滩与上海人》、《近代上海大事记》、《现代上海大事记》、《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等资料书和工具书，以及《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太平军在上海》等译作，总共不下50种。这些研究，上穷远古，下迄当代，以政治史为中心，旁及文化、社会、经济，积累了资料，培养了人才，为《上海通史》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史研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历届院领导都将上海史研究置于突出地位，着力扶持，勤勉有加。历史所之外，经济所、文学所、宗教所、社会学所、法学所等都有一批学者从事此项研究。内以经济所尤为突出，在上海经济史研究方面，资料丰、成果多、质量优，令誉远播海外。在院领导的主持和协调下，历史、经济二所长期合作，承担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国家与上海市多项重点课题，戮力同心，切磋交流。这些合作研究，对于提高上海史研究水平大有裨益。

上海史研究是上海全市历史学者半个世纪以来共同关心的项目。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柳亚子先生领导的上海通志馆，汇集徐蔚南、吴静山、胡怀琛、蒯世勋、席涤尘、胡道静等一批学者，搜集资料，编写志稿，出版集刊，在许多领域里筚路蓝缕，卓有建树，为后人编写上海通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1949 年以后，上海学者又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复旦大学谭其骧、邹逸麟等先生，上海历史博物馆吴贵芳先生等对上海成陆、港口演变等历史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黄宣佩等先生对上海史前文明的考古钩沉，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刘惠吾等先生对上海近代史编写的倡导与研究、对海派文化的阐幽，上海师范大学魏建猷先生对上海帮会史研究的拓荒，中共上海党史办公室对上海党史的发微，上海市档案馆对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图书馆对《上海地方资料》目录的编写，对有关资料的开发开放，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对编写地方志的提倡与领导，都对拓展上海史研究领域、丰富上海史研究资料、提高上海史研究学术水准，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看来这些成果对您主编《上海通史》有很大促进和帮助。

熊：的确如此。编写多卷本上海史的工作，酝酿已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陈先生等已提出编写上海史（包括多卷本上海史）的设想。陈先生在为刘惠吾先生主编的《上海近代史》所写的书评中写道：

那是 70 年代初期，我们一些人刚从“牛棚”里出来，不去打扫校园、打扫厕所了，有了时间想做点事，虽然都因文字吃过苦头，但是知识分子离开文字又能做什么呢？我和刘惠吾同志谈起：过去我们只有上海县志，上海史都是一些外国人写的。我们自己将来总得编写上海史，何不利用现在的时间看书、做卡片、编上海大事记，为写上海史作准备。“文革”的噩梦过去之后，1977—1978 年间，我又为编写多卷本上海史作过设想，开过讨论会，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终因好事多磨，呐喊了一阵，没有走出实际的一步。刘惠吾却在默默地工作着，日积月累地写卡片，随后带同青年教师、研究生一起耕耘上海近代史。

1978 年，酝酿全国史学规划时，著名学者黎澍先生又向唐振常先生提出编写多卷本上海史的问题。1979 年初，在成都举行全国史学规划会

议，上海史被纳入规划，决定由唐振常先生负责，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志承担。此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89年完成了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上海史》。

《上海通史》的编写，得益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对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视。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上海与天津、重庆、武汉及东南沿海、长江沿岸城市研究分别被列为重点。在实施这些项目过程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各地城市史学者多次举行研讨会，兄弟城市史学者的研究成果，给我们以很多启发和借鉴。

《上海通史》自1994年正式立项启动，历时五年。课题组成员凡44人，内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也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历史博物馆的有关学者。课题组同仁或一人独挑一卷，或数人合治一卷，或一人兼治数卷，无论独挑还是合治，每一卷书稿都经过多次讨论，都凝结了集体的智慧。

《上海通史》的编写还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精神上的热情鼓励和经费上的有力支持，得到了浦东发展银行的有力支持。

谢：作为迄今为止的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上海通史》，其内容与布局如何？特别是学术方面有什么特色？

熊：《上海通史》研究的时限，上起史前时期，从六千年前崧泽文化说起，下迄当今1997年。上海是个内涵不断变化的名词，初为浦名、镇名，再为县名，最后成为市名。上海县、上海市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均有广狭之别，“上海市”还有不同涵义，一指城市，一指行政建置单位。本书确定的研究原则是：以现实的上海为基础，以历史的上海为重点。比如，清代上海县属于松江府，松江府下属的其他几个县如华亭、青浦、奉贤、南汇、金山等，太仓直隶州下属的嘉定、宝山、崇明、川沙，现在都在上海市辖境内，我们在叙述清代上海历史时，便以上海县为重点，兼及其他诸县。

全书分为15卷，其中《导论》一卷，综合讨论上海自然环境、不同时期上海历史演变脉络、上海城市特点、区县特色，介绍中外学术界对上海史的研究动态，探讨带全局性的一些问题，包括租界及其影响、上海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海派文化、上海人形成与认同。导论带有导读性质。《附录》一卷，包括大事要览、职官表、建置沿革表、旧新路名对照表和重要道路历史概要。《古代》一卷，叙述开埠以前上海地

区的历史，尽可能地包括各个时期上海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情况，以期与后面几卷贯通。晚清（1842—1911年）、民国（1912—1949年）、当代（1949—1997年）三个时期是本书重点部分，各分四卷，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进行叙述。政治卷一般按时间叙述；经济、社会、文化各卷，在考虑时间的前提下，再适当分类。经济包括商业、工业、金融、交通诸方面，社会包括人口、职业、社会组织等。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宗教诸方面。各个时期并列的四卷，互为背景，互相交叉。全书根据内容，插图一千多幅片，图随文走。编写地方城市历史，最忌的是没有突出地方性，简单地用全国通史的骨架，填进地方内容。《上海通史》作如此架构是从地方特点出发的。

谢：您能否谈谈编写《上海通史》时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熊：我感到最突出的难点是：第一，系统性。通史重点是近现代部分，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要具体论述。其中，政治、经济以前研究的比较多一些，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这需要我们下很深的资料功夫。

第二，当代部分。通史的下限是1997年，我们当初考虑这一问题时，便想到有许多问题的处理难度，包括资料、论述两方面。但是，最后还是知难而进。司马迁写《史记》，也是不回避当代史的，我们编通史，没有理由置1949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于不顾。

谢：我们已经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文化和上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对此都很重视，多次召开研讨会。请问这些情况在国内外有何反响？对你们编写《上海通史》有什么作用？

熊：“上海史热”方兴未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上海史研究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近十年中，在美国，福特、卢斯基金会多次资助上海史研究项目，英语世界最权威的亚洲研究刊物《亚洲研究季刊》在1995年特辟上海史研究专号，显示了这一领域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德国、法国、日本的上海史学者已形成规模可观的群体。在上海，已接连开过四次关于上海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史的著作成批涌现，“上海热”已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还看不出降温的迹象。《上海通史》就是在这一学术氛围中立项起步的。

谢：那么请问，“上海史热”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熊：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简要地说：第一是上海地位重要。上海之于中国，有如美国之于世界，历史短，发展快，人口杂，能量大，蕴含丰